

《诗经》解读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李炳海 编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诗经》 解读

李炳海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解读/李炳海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9840-1

I. 诗…

II. 李…

III. 诗经-文学研究-教材

IV. 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8820 号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

《诗经》解读

李炳海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33.25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40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纪宝成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圇吞枣的弊病。

这实在是一种进步。”这种看法显然是通达和正确的，值得今人加以借鉴。今天我们编写这套教材，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对学生经典学术教育，而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读经。

国学的精华主要凝聚在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和顺序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最后确定下来的。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时编修《四库全书》，也是按经史子集四部来整理和编修的。四部不光是目录学的概念，而且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也存在一定的关联。一般说来，经部、子部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哲学学科，史部大略相当于历史学科，而集部接近于现代的文学学科，这说明国学与现代学科分类是可以互相兼容的，并不存在水火不相容的问题，当年的北大国学门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是将四部与现代学科互相融合的。因此，传统经典教育与现代教育可以相得益彰，和谐相生。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思想及其理解中存在的偏颇，国学并没有在百年来的教育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与国学教育在社会各界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党和政府不断强调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随着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之局的到来，国学走向振兴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所说的国学，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辨析与创新，是今人眼中的国学；其三把国学看作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来阐释、比较、辨析与创新，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因此，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现代价值和创新精神，国学内在的融合中外、推陈出新的精神与能力，是我们今天在建构和谐社会，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对于传统经典的解读、阐释与辨析，毫无疑问是对于这种理论创新能力的激活，国学的生命力也在这种创新中得以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因此，在国学教育中，这种经典的研读、阐释与辨析，是最要紧的门径之一。

中华经典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特质来说，属于一种世俗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典多属神学系统大不相同。比如，《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孔子与学生思想观念的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充满着世俗人情的意味。再比如《庄子》这本书，也很关注通俗的演绎。因此，认为经典高不

可攀的看法并不准确。不过，经典毕竟是经典。唐人编的《艺文类聚》对于经典的解释是“经也者，径也，言五路无所不通”，也就是说，经典承载着普适性道理，好比通向各条路径的通衢一样，它必然会去掉那些浮浅的东西，提升为哲理，有的在形态上不可能不深奥，如《周易》与《老子》这一类经典。因此，需要做一些解读与注释的工作。历来对于经典多有注释与解读，乃至于形成了专门的学问。

经典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就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程度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几年，以《论语》、《庄子》等为代表的国学经典，通过现代传媒的推介与个体阅读，在国民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它也证明，国学经典教育在今天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教学方案中，经典教学类的课程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它与现代文史哲专业教学的一个不同之处与亮点所在。为了满足国学院的教学需要，同时也为了顺应向海内外重张国学经典教育的时代大潮，我们编写出版了这套“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的学术定位，绝不是一般的教材，而是追求具有深厚学术底蕴，深入浅出，明快易读，从而履行中国人民大学追求一流，服务大众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编写体例上，我们要求体现出“国学经典解读”的宗旨。虽然古往今来，关于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类书籍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是以国学的精神与方法去解读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本系列教材集中从国学的角度去对传统经典进行解读，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当代人文视野，贯彻义理、文章与考据融为一体的精神，打通现代文史哲三科的中间环节，通过解读与讲授，培养学生从经典中掌握国学知识，领会国学精神，提高治学能力，从而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关于选择范围，有的是全本，有的则是选本，选本要求依据编写指导思想在字数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代表性篇目。

篇目注释与解读，是本套教材的重点所在，它由两部分组成：注释时力求准确严谨，同时行文上明快易懂。全篇解读则力求从传统经典中开掘出国学基本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知识与精神方面获

目 录

177		凤鸕
07		和苦言
28		风谷
38		令简
08		门北
50		文错
40		台陈
70		供陈
00		英言
前言		1
201		中式之家
001		陈陈
关雎		21
葛覃		24
卷耳		27
桃夭		30
芣苢		32
汉广		34
汝坟		37
鹊巢		40
采蘋		42
甘棠		45
羔羊		47
殷其雷		49
標有梅		51
小星		53
江有汜		55
野有死麋		58
柏舟		61
绿衣		65
燕燕		68
终风		71
击鼓		74

凯风	77
匏有苦叶	79
谷风	82
简兮	86
北门	89
静女	92
新台	94
柏舟	97
墙有茨	99
桑中	102
定之方中	105
相鼠	109
载驰	111
淇奥	114
考槃	117
硕人	120
氓	124
芄兰	129
伯兮	131
有狐	134
木瓜	137
黍离	139
君子于役	141
扬之水	143
兔爰	145
葛藟	147
采葛	150
大车	152
缁衣	155
将仲子	158
大叔于田	160
羔裘	165
女曰鸡鸣	168

山有扶苏	170
丰	173
出其东门	175
野有蔓草	177
溱洧	180
鸡鸣	182
东方未明	184
南山	186
猗嗟	191
陟岵	196
伐檀	198
硕鼠	201
蟋蟀	204
绸缪	207
鸛羽	210
葛生	213
车邻	215
蒹葭	218
终南	221
黄鸟	224
无衣	228
宛丘	231
东门之枌	234
衡门	237
防有鹊巢	239
素冠	241
隰有萋楚	243
蜉蝣	246
候人	249
七月	252
鸛鸛	259
东山	262

小 雅

鹿鸣	269
常棣	272
伐木	276
采薇	280
出车	284
南有嘉鱼	290
南山有台	293
六月	297
车攻	301
鹤鸣	305
白驹	307
斯干	310
无羊	315
节南山	318
十月之交	323
雨无正	328
巧言	334
巷伯	338
大东	342
北山	347
楚茨	351
信南山	357
大田	361
车辖	365
宾之初筵	370
鱼藻	376
采芣	378
都人士	383
白华	386
何草不黄	389

大 雅

大明	395
绵	401
灵台	407
生民	410
公刘	417
卷阿	423
板	428
荡	434
云汉	439
崧高	445
烝民	450
韩奕	455
江汉	462
常武	466
瞻卬	471

周 颂

清庙	479
臣工	481
振鹭	484
有客	486
载芣	488
丝衣	491

鲁 颂

駉	495
閼宫	499

商 颂

那	511
长发	514

前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后来又成为重要的国学经典。《诗经》还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教材之一，它在结集成书以后，便成为各类教育的课本，使用的时段覆盖从春秋到清代的漫长岁月。

一、《诗经》名称的由来

《诗经》在开始阶段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古诗，就其文字而言属于歌词。《诗经》最初称为诗，在它成为经典之后才称为诗经。

诗经最初是用于演唱的歌词，为什么称之为诗？这要从文字的构形谈起。诗，字形从言从寺。言，表示人开口说话或歌唱。寺是侍的初文，字形从寺者多有准备、等待之义。如：侍，指服侍、伺候、等待为对方服务。恃，指依赖，是由等待之义引申而来。峙，指储藏，准备。至于秦汉时期祭祀五帝的祭坛称为峙，那是因为祭坛是为神灵而设，等待神灵的到来。

诗字的构形所表达的是言出而又所等待的意思，用它来称呼最初的歌词，是因为早期的歌词大多都是有唱有和的方式。《尚书·皋陶谟》有如下记载：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皋陶和虞舜既相互对话，又彼此对歌，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对歌的最早记录，反映的是远古时期的歌咏方式，即一方歌咏之后，对方要加以回应，采用的是对唱的方式。

《穆天子传》卷三有如下记载：

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和周穆王也是采用对唱的方式言志抒情。西王母首倡，周穆王应和，有来有往，表达彼此间的依恋之情。这是一则历史传说，未必完全是事实，人们是按照当时歌咏的方式想象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交往，如果当时的歌咏不是采用对唱的方式进行，也不会凭空想象出周穆王与西王母一唱一和的情节。

进入春秋时期以后，这种一唱一和的歌咏方式仍然可以经常见到。《左传·隐公元年》叙述郑庄公与其母姜氏在隧道中相见，其中有如下情节：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郑庄公母子通过一轮对唱，化解了先前的积怨。他们都是即兴演唱，歌词是各自所创，郑庄公倡于前，姜氏回应于后。

《左传》所记载的即兴对唱还见于宣公二年，宋国筑城人员先是以歌谣嘲讽战败逃回来的华元，华元令其随员以歌谣反击，最后筑城人员再次以歌谣相讥，华元不得不离开筑城工地。

相互对唱是中国早期最基本的歌咏方式，《诗经》有的作品就保留了这方面的痕迹。《郑风·萼兮》全诗如下：

萼兮萼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萼兮萼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这首诗出自女子之手口，她在歌咏时请对方首倡，自己进行应和。由此不难想象，在正常情况下，这首诗唱完之后对方会开始歌咏，然后女子再继续应和。

《大雅·卷阿》首章称：“岂弟君子，来游来歌。”这首诗作于周成王

在岐山大会诸侯之际，其中的君子指来朝的诸侯，他们以歌咏的方式表达聚会的欢乐。诗的结尾写道：“矢诗不多，维以遂歌。”作者交代该诗的创作缘起，他是以诗配乐加以演唱，用以回应来朝诸侯的歌咏，是以朝廷大臣的身份与来朝诸侯对唱。

《诗经》在开始阶段都是歌词，用以演唱，当时的歌咏往往采用对唱的方式。这样一来，就使得进行歌唱的人有一种心理期待，要得到对方的回应，对方也会为回应做好准备。这样一来，用以演唱的歌词就被称为诗，表示期待、准备之义。歌词通常都很精练，有节奏和韵律，所以，歌词这种文本也被称为诗。这样，诗就变成了一种文体的名称，而它所蕴涵的准备、等待的意义，通过字形得到了保存。诗，字形从寺；寺既表义，又表音，其意义是等待、准备，这是诗字的最初内涵。

《诗经》在先秦时期通常称为诗，或称为诗三百。至于后来称为《诗经》，和它被用作教材直接相关。《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的申叔时在谈到贵族子弟的教育时提到了多种课本，其中就包括《诗》：“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诗》是贵族子弟所用的课本，具体的讲授是“诵诗以辅相之”，通过咏诵作品而对贵族子弟进行熏陶，使他们健康成长。《左传》、《国语》记载大量春秋时期士大夫赋诗引诗的事象，这也有力证明，这些贵族成员受教育阶段，《诗》是他们的必修课。否则，他们不可能引诗赋诗如数家珍，对作品极其熟悉。《诗》是周代官学的重要教材，是贵族子弟受教育阶段必备的课本，从而确立了其权威地位，为它后来成为经典奠定了基础。

把《诗》称为经，首见于《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这是假借孔子之口，把《诗》和其他五部书统称为六经。这里透露的信息表明，《诗》被称为经，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直接相关。孔子所开设的私学，把《诗》作为基本课程。孔子特别重视弟子对《诗》的学习，反复强调其重要性，具体论述见于《论语》的《子路》、《阳货》、《泰伯》、《季氏》等篇。孔子对《诗》也很熟悉，反复加以引用和评论，具体见于《论语》的《为政》、《八佾》、《阳货》、《子罕》。另外，《左传》记载孔子引诗七处，《礼记》所载孔子引《诗》多达六十九处。至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则应是孔子讲《诗》的记录。孔子是儒家

的创始人，在成为宗师的同时，孔子及其传人所推崇的《诗》，自然也就成了经典，尊之以经。《礼记·经解》是解经之作，其中所列的六经就包括《诗》，把它列为六教之一。《诗》而称为经，与孔子及其传人对它的弘扬、传授直接相关。

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都有自己的经典。《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被称为《道德经》。《墨子》是墨家的经典，既有《经上》、《经下》，又有《经说上》、《经说下》。《诗》被尊为经，《老子》、《墨子》也被称为经。在这个历史阶段，《诗》的地位与其他学派的经典共存并立，还没有显得特别突出。进入汉代以后，传经《诗》者分为齐、鲁、韩、毛四家，这些传《诗》的经师陆续进入朝廷任职，事见《汉书·儒林传》。鲁人申公在武帝朝任太中大夫；齐人轅固生景帝时为博士；燕人韩婴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任常山太傅，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辩论于朝，赵人毛萇为河间献王傅。这些经师原本在民间讲授《诗经》，属于私学，他们进入朝廷，特别是担任博士之后，使得《诗经》在朝廷传授成为专门的学问和职位。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诗》遂由儒家一门之经跃为王朝之经，天下之经。

《诗》被尊为经，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地位，使得它在更大范围得到普及，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把《诗》作为基本的教材。同时，对《诗经》的注释、解读也成为一门显学，并走上经学化的道路。

二、《诗经》的作者、采录和编辑

《诗经》内容丰富，覆盖广阔的地域，它的作者也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有周天子、周王朝诸侯、大夫、士人，还有农民、船夫、猎手等普通百姓，还有许多女性。《诗经》绝大多数篇目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只有少数几篇在作品或其他典籍中做了标示。作品本身做了标示的篇目是：《小雅·节南山》是家父所作，《小雅·巷伯》是寺人孟子所作，《大雅》中的《崧高》和《烝民》是尹吉甫所作。其他先秦典籍标示作者姓名的，如：《尚书·金縢》称《豳风·鸛鸣》是周公所作，《左传·闵公二年》称《邶风·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国语·楚语》称《小雅·抑》是卫武公所作。除此之外，还有些见于关于《诗经》作者的记载，但是否可信，需要进一步考辨才能确定。

《诗经》作品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周王朝及诸侯国乐官所掌握的用于各种礼仪的歌诗；二是周王朝派专人到各地采集的诗；三是朝中大臣所献的诗。

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有乐官，他们所保存和整理的歌诗，有的后来就编入了《诗经》。《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是宋国的乐官，他到周王朝太师那里去校对《商颂》十二首，其中五首流传至今，保存在《诗经》中。《诗经》有相当一部分取自乐官所掌的歌诗，这些作品往往用于各种礼仪。

中国很早就有采诗制度，对此，《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师旷引《夏书》有“道人以木铎徇于路”之语，指的就是采诗。《汉书·艺文志》称：“故古人采诗之官，王者所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亦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里所说的行人，指的是天子派出的使者，负责采集各地的歌谣。除《汉书》的上述记载外，钱锺《方言笺疏》卷十三所载刘歆《与扬雄书》、《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都提到古代朝廷派人采诗事宜。《诗经》所涉题材很广泛，有许多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作品，如果没有采诗制度，它们很难进入《诗经》。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大臣对君主以诗相谏的传统，先秦文献对此记载很多。《左传·襄公四年》写道：“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是商周之际的人物，弃商从周，得到周文王的信任，担当太史之职。流传至今的《虞人之箴》，据说当时就是虞人听从辛甲的指令，为讽谏君主而作。对君主以诗相谏，见于先秦典籍的还有《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上》、《国语·晋语六》等。《左传·昭公十二年》还具体叙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讽谏周穆王的情况。《诗经》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大臣为讽谏君主而作，并且献给朝廷加以保存，后来就编入了《诗经》。这类作品以变雅居多，主要用于批判朝廷的时弊。

《诗经》作品来自多个渠道，它的选录、结集，是周王朝乐官完成的。成书后的《诗经》，许多地方留下了乐官采录编选的痕迹。

第一，《诗经》章句排列比较整齐，有规律可循。除《周颂》和《商颂》前三章是由单章构成外，其余作品都是由几章构成。由多章构成的篇目，大多数作品各章的句数相同，可以用同一种曲调演唱。这是因为，能够用同一曲调演唱的歌词，各段句数必须相同或大体一致，《诗经》多数作品合乎这一要求。《诗经》有些作品虽然各章句数不同，但其排列也是